

“全球南方”身份的多元建构与中印话语比较

杨越茗 崔 铮

〔内容摘要〕 随着全球权力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全球南方国家正在运用集体力量重新定义国际体系的边界,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行为体。“全球南方”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客观意义上的国家集合,其蕴含的规范性力量显示了这一概念的延展性与活力。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建构范式观点,将其存在视为在与他者的差异性话语中不断被建构和重塑的结果;弥补了理性主义认识论静态视角的不足。以“全球北方”这个最显著的“他者”为例,“全球南方”的差异性话语既包括被殖民、落后和边缘要素的刚性话语,也包括蓬勃发展和主张道义要素的柔性话语,深刻展现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多维属性和反中心性。虽然“全球南方”的身份结构提供了基本话语范本,但由于不同国家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丰富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类型。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为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水平具有相似性,因此与之相关的落后与蓬勃发展这两个话语要素也展现出相似之处;然而,两国在历史观、国际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被殖民、边缘和主张道义的话语特征中分别呈现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立场鲜明、张弛有度的进取型,和以印度为代表的谨慎回避、稳定克制的保守型。

〔关键词〕 后结构主义 “全球南方” 身份建构 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 杨越茗,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崔铮,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6)01-0129-26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指的是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涵盖了国际社会中大多数经济相对落后、社会发展水

平较低的国家与地区。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大量亚非拉国家的地位逐渐提升,它们积极合作参与国际事务,既为应对世界大战造成的深重损失,也为解决殖民统治遗留下的社会动荡与生产力低下等问题。在冷战格局下,20 世纪 80 年代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关注到了全球南方国家遭受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他发现除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日本之外,北纬 30 度以南的绝大多数国家面临严峻的贫困、债务和发展困境,这清晰地展示了世界财富与贫困的分布格局。^①以“勃兰特线”为基础,国际社会开始利用“南—北”概念表示国家的发展程度。此后的数十年里,以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脱离了全球南方国家范畴,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成为新的南方国家,自此“全球南方”格局基本固定下来。面对当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的全球治理新环境,全球南方国家依旧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力量,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数字治理、全球卫生等议题中,越来越多地共同发声并影响国际规则制定。

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与之相关的议题也不断拓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全球南方”并非是单纯的地理划分或发展中国家集合,其蕴含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象征具有影响权力分配的规范性力量,使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找到自我定位,并据此确立参与全球事务的合法性基础。“全球南方”身份究竟如何建构?为什么“全球南方”这一概念能够替代其他概念获得广泛认同并继续延展?不同行为体对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否存在分歧?本文基于对“全球南方”内涵的既有研究,进一步从后结构主义的动态视角分析其身份特征,揭示该概念内部的优势与不足,并以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南方国家的话语实践为例,对比分析“全球南方”话语建构中不同国家的具体路径与表现。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解释视角

国际社会关于“全球南方”尚未形成统一共识,学界围绕这一概念提供了权

^① Willy Brandt,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0, p. 31.

力分配、制度作用和观念建构三种解释视角。

“权力分配观”认为,“全球南方”概念来源于体系结构中权力的再平衡,反映了相对弱势国家在争取更大话语权与制度性影响力过程中,围绕共同的利益诉求而逐步汇聚成的政治与认同框架。每个全球南方国家在追求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都在致力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国际体系中争取更多权益,以满足自身需求;各国因利益和目标的相似性而汇聚成合力,最终形成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① 具体而言,全球南方国家主要围绕全球经济重心转移、战略自主性增强两个议题来争取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地位。^② 另外,全球南方国家也是揭示结构性不平等的重要工具,表明其并不仅属于地理范畴,也是一种政治经济表征与“反抗联盟”的具体实践,^③尤其在反殖民斗争中,对不公正秩序的挑战表现得尤为突出。^④

“制度作用观”认为,“全球南方”的出现与整体崛起体现了一套新的规范、原则、机制和行为模式,是全球治理的“替代方案”。“全球南方”意味着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被重塑,具体表现为在国际制度上保障公平正义,在国际规范上尊重文明多样性,在权力结构上反对大国霸权。^⑤ 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气候谈判等传统外交场域,推动发展权、公平责任等议题进入国际议程,积极为国际事务提供新的“南方方案”,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衡、有序的方向演进。^⑥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成立越来越多的区域制度和多边机制,在安全与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挑战和补充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单极秩序正在衰落,并向一个多元、多中心、制度化程度更高的“多厅影院世界”演

① 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1~23页。

② 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2~130页。

③ Anne Garland Mahler, *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Race, Radic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4.

④ Caroline Levander and Walter D. Mignolo,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The Global South*, Vol. 5, No. 1, 2011, pp. 1~11.

⑤ Jacqueline Anne Braveboy-Wagner, *Institut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p. 214~215.

⑥ 孙吉胜:《“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38~44页。

变。^① 拉美地区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积极推动制度性改革的行为体之一,以该地区为例可以发现,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制度中兼顾参与和挑战的双重角色。这种立场既不同于对既有秩序的单向依附,也有别于彻底的对抗,它是一种制度内改革的努力,并利用其制度和规范制约大国和对抗美国霸权特权。^②

“观念建构观”则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其形成是基于南方国家的共有观念。尽管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行动仍然有限,尚未发展出真正的实体化组织,但它们普遍享有相似的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最主要包含三大意涵,分别是地理上的区位意涵、经济上的发展意涵以及地缘政治上的联合自强意涵。^③ 这种政治观念还表现为一种集体意识——对发达国家的警惕。南方国家在西方主流知识体系内长期被忽视,主张应该尊重多元文化,强调地方性经验,追求建立更平等的全球知识体系。^④ 具体来看,“全球南方”分别从领土、种族关系、体系结构和政治实践四个方面形成了共有观念:在领土方面被描述为现代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经验所主导的广袤领域;在种族关系方面,是被边缘化的有色人种文明统治的精神空间;在体系结构方面,是受失衡的结构性差异影响的边缘地区;在政治实践方面,旨在团结一致追求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消除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与歧视。^⑤ 在共有观念的讨论中,身份认同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由历史实践、政治使命和规范共享交织的集体身份,既反映对殖民遗产的回应,也体现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⑥ 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认同体现了五方面的共识,分别是遵循情感上要团结不要分散、政治上要自主不要压迫、经济上要发展不要剥削、文化上要多元不要一元、外交上要多边

① [加]阿米塔·阿查亚著,袁正清、肖莹莹译:《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 ~ 12 页。

② Luis J. Rodriguez and Christy Thornt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5, No. 5, 2022, pp. 626 ~ 638.

③ 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人民论坛》2023 年第 23 期,第 116 ~ 120 页。

④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Beyond Abyssal Thinking: From Global Lines to Ecologies of Knowledges,” *Review*, Vol. 30, No. 1, 2007, pp. 45 ~ 89.

⑤ Nikita Sud and Diego Sá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3, No. 6, 2022, pp. 1123 ~ 1150.

⑥ Siba Grovogu, “A Revolution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Vol. 5, No. 1, 2011, pp. 175 ~ 190.

不要单边。^①

既有研究从利益诉求、实践形塑、概念认知等角度对“全球南方”的特征进行了全面剖析,阐释了“全球南方”作为行动主体的形成原因及其如何认知两个问题。在现有文献中,普遍认为“全球南方”是受到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的双重影响,这两种范式都倾向于将“全球南方”理解为已经存在的客体,然后分析它如何行动、如何影响国际秩序。既有研究虽然在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全球南方”,但仍存在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因此,本文首先从后结构主义入手突破现有研究从静态定义研究“全球南方”的局限性。本文拒绝固定化定义,而是认为“全球南方”是通过话语差异与身份建构不断生产的动态概念,更注重揭示其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进而得到这一概念的动态和交互特征。

二、“全球南方”概念中的身份建构

后结构主义为理解“全球南方”提供了独特视角,强调在话语生产中的身份建构,认为“全球南方”在“全球北方”这一“他者”的对比下被不断界定与重塑,阐明全球南方国家在权力关系与话语结构中争取主体性与话语权的动态过程。两者围绕“被殖民”“落后”“边缘”三个对立身份要素与“蓬勃发展”“主张道义”两个非对立身份要素建构起来。

(一) 后结构主义话语建构下的政治身份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后结构主义作为反思主义理论流派中的代表性理论,放弃了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基本假定,强调话语的本体论地位以及话语在观念建构中的核心作用。将话语置于主体性地位意味着话语被认为是更基础、更具决定性的力量,此时的国际体系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独立实体,而是话语运作的结果。一方面,话语决定了行为体的认知。正如温特所说,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经典判断提出了国家、联盟或国际机构等主体并不独立于人的意识和

① 张一飞:《“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基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45~61页。

行动而存在的建构主义认识论。^① 后结构主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话语先于现实并塑造社会现实,它划定什么是可说的、可想的,甚至什么是“真实”的。可以说,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都是植根于话语的主观体现,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话语建构和表象。^② 政治话语并非中立地反映一个客观的“国际社会”,而是通过具体话语内容积极地塑造我们如何看待国际关系以及国际规范和制度。另一方面,主体通过话语改造认知。话语为日常实践提供了框架,并定义了可能的社会行动领域;^③ 也可以通过塑造内部关系、影响行为体观念的方式来体现权力,在国际社会中使他人也产生认同同时塑造了其他行为者的自我理解和利益感知。^④

话语深刻地影响着行为体如何理解以及如何体验和认识世界,这些有关自我的话语共同解释了行为体身份。后结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都是流动和多变的,并且受到特定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影响。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国家本质”,国家身份正是通过话语实践在被不断地构建和重塑。后结构主义指出国家身份的确立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共同塑造。国家身份既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本质话语所解释,又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在本质话语中的区别来划定身份边界。^⑤ 这意味着话语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词汇和分类系统,用以描述和理解自我与他者。以受害国与侵略国这组对比明显的关系为例,作为侵略国的身份总是承担着不道德、邪恶、强势、危险等特质,与之对应的是合乎道义、正义、温和、和平的受害国身份。

后结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并非孤立存在,本质上是通过“他者”的镜像建构出来的,这种“他者”建构不仅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普遍是通过与他者“既相似又有差异”的状态,以实现自我身份的确认与稳定。在非极端他者的建构中,两者差异可能被一种相似性所掩盖,使差异被弱化、模糊或美化,从而让合作关系

①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 ~ 425.

② 宗华伟:《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探析——来自后结构主义身份认同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1 期,第 64 ~ 98 页。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Juridical Apparatus,” in William Connolly ed.,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01 ~ 222.

④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1957, pp. 201 ~ 215.

⑤ 赵洋:《语言(话语)建构视角下的国家身份形成——基于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第 12 ~ 22 页。

得以维系。例如,虽然美国和德国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但其深层的民主含义截然不同:美式民主源于对暴政的恐惧,^①而德式民主诞生于对混乱的警惕。^②面对非极端他者的身份结构分析,应在表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继续解构两者之间被掩盖的差异。

在具体的分析实践中,不同语境下的身份表述,取决于哪些“他者”被引入以及如何被表述。根据问题的不同总有一个显著突出的“他者”或者因为议题的特性而只有一个唯一“他者”。在一般的政策性分析中,出台政策的主体是后结构主义分析中的“自我”,而被实施方显然是唯一与之对应的“他者”。例如,莱娜·汉森分析了美英两国在巴尔干战争中的话语与政策,在美英话语中的“他者”就是巴尔干国家。^③在某些特殊议题上,行为体本身还可能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同时间阶段形成对应的“我一他关系”。例如,赵洋在分析2010年后的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时就以不同时间阶段的中国作为在时间维度上的他者进行讨论。^④而本文探讨的是“全球南方”的政治身份,“全球北方”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是南方身份和发展话语的主要参照,用“全球北方”作为“他者”能够最清晰地揭示“全球南方”的身份生成和话语限制。因此,“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应该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结构进行分析,才能够揭示其政治身份如何在权力关系与话语互动中被不断生产、再现与重塑。

(二) 被殖民、落后与边缘的刚性话语

“全球南方”涵盖了国际体系中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其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被殖民、落后以及边缘这三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战后才获取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始联合起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样共商共议的合作基础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坚持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

①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The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Must Furnish the Proper 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载杨慧林、金莉主编:《联邦党人文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391页。

② 宋惠昌:《德国议会民主政治的权力制约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3期,第48~56页。

③ [丹]莱娜·汉森著,孙吉胜、梅琼译:《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西尼亚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25页。

④ 赵洋:《纵向建构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形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第108~130页。

上,全球南方国家相继成立了“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随着有关会议和组织常态化举行,又逐渐被内化为国际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个要素已经成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代表符号,与全球北方的帝国、先进和霸权形象完全对立起来。在这种结构下,“全球南方”被完全置于北方的核心地位之下,被塑造为不得已的“受害者角色”。“全球北方”被对立的刚性话语描述为完全对立的极端他者,是影响南方国家发展的阻碍。

首先,“全球南方”的被殖民要素。15 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开辟了通往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新航线,开启了殖民扩张的时代。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殖民主义达到顶峰。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都在较长一段时间丧失主权,被身为宗主国的全球北方国家控制。“全球南方”的被殖民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在殖民时期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其政府和行政机构受宗主国控制,宗主国任命官员或扶植傀儡政权来管理殖民地。二战后殖民体系崩溃,全球南方国家开始争取自身权利。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万隆会议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动。该会议作为全球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反殖民政治共识。此外,“全球南方”的被殖民要素还体现在文化层面。宗主国曾经利用教育和宣传将语言、宗教强加给被殖民的南方国家,以西方文化压制本土文化,导致独立后的南方国家传统文化难以传承发展。殖民统治破坏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原著语言被忽视,西方知识体系被视为唯一合法的知识形式,西方媒体和文化产品成为权威继续冲击着本土文化价值观。

其次,“全球南方”的落后要素。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主要原因是受到殖民时期资源剥削的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长期被宗主国大量掠夺,而殖民地不仅是初级原材料供应地,也是工业加工商品的倾销市场,导致全球南方国家长期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缺乏自主发展能力。独立之后的全球南方国家依然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多数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仍然有限,仅少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较快,但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社会发展仍不充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用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

整体水平,从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体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根据 2025 年报告显示,所有的北方国家都达到了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且得分较高,普遍超过 0.9 分;部分南方国家,例如阿联酋、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虽达到了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但得分仅维持在 0.8—0.9 分这一区间;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还是集中在高人类发展及以下。^① 这一指标清晰地表明了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发展差距。

最后,“全球南方”的边缘要素。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无论在何种体系中的代表性都显得不足。从威斯特凡利亚体系至今大国政治始终占据着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广大南方国家则长期被排斥在决策核心之外。全球南方国家在治理架构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严重缺失。一方面,在重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全球南方国家虽占据人口优势,但在机构中的话语权远低于其经济体量,缺乏决策权,难以参与和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发达国家以北方经验为中心主导着产业升级、气候环保、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议程设定,南方国家只能被动适应。

(三) 蓬勃发展和主张道义的柔性话语

在“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过程中,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逐渐崛起,蓬勃发展和主张道义两大要素也在日益显现。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全球南方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不仅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也日益增加,还将人道主义关怀融入其外交主张,展现出独特的道义取向。因此,蓬勃发展和主张道义也成为了“全球南方”概念的代表符号。这两大要素分别与全球北方高度发达和西方价值观的要素一一对应。这种非二元对立的柔性话语使“全球南方”不再处于次要地位,“全球北方”是与“全球南方”共同面对问题的“参与者”,双方也扮演着合作伙伴的角色。

首先,“全球南方”潜力巨大,发展势头迅猛。到了 20 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展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document/hdr2025reporten.pdf>.

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生产结构重组与国际分工的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南方国家的平均增长率约为 5%,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1993 年至 1998 年间,按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1985 年购买力平价)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 1.2 亿。^① 另外,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治理能力也有明显提升。大多数国家不仅解决了基本的政权和社会稳定问题,还尝试建立地区规范,主动承担维护稳定和加强协商的国际责任。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不同职能的国际组织相继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合作机制。

“全球北方”作为高度发达的国家集合体,经历了从 19 世纪工业化奠基,到 20 世纪冷战制度化与冷战后全球化主导,再到 21 世纪多极化挑战的历史演变。北方国家不仅在物质层面主导全球资源流动,在制度与规范层面也构筑了全球发展模式的参照系。虽然“全球南方”与之相比发展较晚,在 20 世纪中后期才逐步发展工业化与先发的北方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但全球南方国家以新兴经济体身份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全球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一同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此外,双方还共同面对产业升级和国际秩序变革等严峻挑战。双方面面对的社会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长期以来全球北方都在致力于提升生产效率,并解决生产力飞跃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级深刻变化以及国际秩序转型等问题,使全球南方国家意识到与北方国家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虽然不同,但也面临相似困境。

其次,“全球南方”具备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全球南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强调发展权、生存权、公平与集体福祉,突出非干涉、国家主权、以国家为主导的人道主义行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冲突调解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频繁地担任冲突调停国,利用自身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以及更加中立的身份,更好地了解冲突各方的立场和需求。在面对极端冲突的情况下,“全球南方”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调解,促进和平解决争端。例如土耳其与伊朗两国在叙利亚内战期

^① Paul Collier etc. ,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x ~ x.

间积极推动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积极促成停火协议。全球南方国家还主张在冲突中建立人道主义通道,尽量降低冲突带来的次生影响。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到了重大打击,供应中断还导致全球市场的价格飙升。在全球南方国家强烈呼吁下,各方签订了《黑海粮食协议》,保障粮食供应链的稳定,尤其尽量保证向位于非洲和中东粮食最为短缺的国家提供粮食。协议签订后,仅2022年8—9月,运离乌克兰的货物中有约25%是运往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①

在对外援助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也展开了大量工作。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提供援助、支持国际救援行动和推动全球合作,积极帮助应对自然灾害、武装冲突和公共卫生危机等紧急情况。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力,包括应急响应系统、医疗服务和后勤网络。他们分享本国在应对极端危机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帮助受灾受害国家迅速部署资源和人员。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地理因素,全球南方国家在客观上容易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爆发冲突和自然灾害的时候难民选择的第一避难所,因此经常积极参与应对自然灾害、冲突和公共卫生危机等紧急情况。

“全球北方”主张自由主义传统,尊重个体权利、民主治理、人权优先,通常伴随规范扩散与政治条件化援助。虽然“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人道主义的理念基础存在明显差异,全球南方国家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强调自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但在“个人权利”“基本自由”和“人类尊严”等价值目标上,与西方人道主义趋同与重叠。无论是干涉冲突还是对外援助,“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人道主义关怀都具有相同目标,双方紧密合作。在面临重大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双方已然选择共同参与解决的模式。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双方明确承担不同职能,全球北方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专业人员,而全球南方国家主要派遣维和部队。双方基于相似的普世道义与全球责任在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具有共同的目标。

^① UN, “The 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 What It is, and Why It’s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September 16, 2022,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09/1126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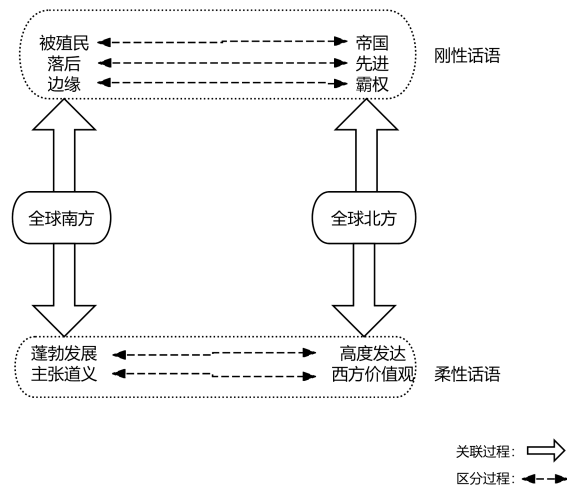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差异化话语结构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三、“全球南方”身份结构的特征

通过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可以发现,“全球南方”并非单一的同质性身份,这一身份结构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多维属性与反中心性。多维属性将众多异质性显著的国家纳入其中,但也可能导致概念的泛化与稀释。反中心性给“全球南方”提供了最基本的规范性诉求,但各国对于西方中心的批判又存在分歧。总体而言,这两个特征既维持了共同的认同基础,又为成员国的差异化表达提供了空间。

(一) 身份结构的多维属性

“全球南方”身份结构超越了一般的类型学划分标准,以多个要素作为身份认同的依据,这样的多维属性赋予了“全球南方”概念独一无二的包容性,给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较为开放的共同身份框架。从效果上看,对内实现了有效整合,使南方国家有机会基于多方面的共同认知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实践中实现身份的流动和演进。全球南方国家内部本身存在着巨大差异:第一,内部社会文化分野显著,涵盖了世界四大宗教的主要文化圈层:中东中亚、北非西非的伊斯兰文化区,南亚的印度教文化区,拉美的基督教文化区和东亚的佛教文化区。第

二,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君主制政体也有威权政体;在国家战略上的国家选择也存在不同,既有发达国家的坚定伙伴,也有西方国家的反对者,还有选择战略自主的国家。第三,实力规模的梯度差异,既有大型新兴市场,也有中等规模经济体,甚至还有有的全球南方国家仍然是尚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脆弱经济体。“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并不以某一特征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它构建了一个包含多重要素的立体且多元的形象,这种做法不仅减轻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同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全球南方”形象从历史—制度维度、经济—实力维度、政治—战略维度、发展—时间维度、价值—文化维度出发,共同形成了多元的身份标准,将众多异质性显著的南方国家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全球南方”身份的多维属性在提供包容性优势的同时也存在难以协调的不足。“全球南方”所承载的复杂意义与多重内涵,使这一概念本身变得异常松散。首先,多维属性使“全球南方”的成员范围与边界难以明确界定,从而在理论建构与政策实践中造成概念的泛化。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并非典型的全球南方国家,它们兼具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征与“全球南方”的话语特质,这模糊了“全球南方”的身份边界。其次,多维属性赋予“全球南方”身份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这种内部张力使南方国家难以同时兼顾,在解释和使用“全球南方”身份时可能根据自身利益和议题选择性做出调整与取舍,从而难以形成一致性表达。最终,“全球南方”逐渐演变为一个象征性、开放性的笼统标签,而非严格的分析性概念。在实践中,各国对“全球南方”身份的具体理解和运用存在较大差异,这既体现了其包容性优势,也暴露了多维属性导致概念模糊的局限性。

(二) 身份结构的反中心性

“全球南方”的身份结构通过批判性建构挑战“中心—边缘”格局,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和制度霸权。从三个对立身份完成对中心的反思,又通过两个非对立身份实现新的自我建构,共同体现了反中心性的动态过程。首先,反对以“全球北方”为中心的唯一视角。“全球南方”的观念建构不仅揭示了双方之间互不兼容、相互排斥的基本属性,还体现了双方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共同基础。

在这样一组矛盾关系中,“全球北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中承认了自己的次要地位,也不再是大国的附庸。其次,反抗以“全球北方”为唯一标准的发展路径。全球北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和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给国家带来了强势的增长,长期被视为“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意识到这种模式不仅难以复制,也存在缺陷。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挑战以欧洲现代化、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线的西方史观叙事,真正地表达了在国际体系中前所未有的自我肯定。由于自我叙事愈加完整,“全球南方”的身份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移——从被西方定义的“他者”和“问题区域”,转变为生产知识、平等对话的对象。

“全球南方”身份的反中心性全面地展示出了南北关系的复杂性,也容易导致南方国家在如何反对“西方中心”及应对策略上出现分歧。全球南方国家强调与全球北方国家之间难以逾越的差异,曾经的历史经历和当前的地位差距会长期存在。殖民时期造成的民族仇恨和历史创伤仍然没有消解,全球南方国家在爱国和历史教育中涉及的相关内容,会对国家公民施加定向影响以形成关于国家形象的记忆内容,^①这种对“全球北方”的消极认知会随着代际传递下去。许多西方国家将此解读为制度性抵制,侧面形成的对立氛围与身份对抗,可能加剧南北合作的困难,导致南北之间的信任赤字加剧。由于不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定位存在分歧,所以反中心性虽然通过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但也进一步造成了南方国家话语的分化与差异。

四、“全球南方”概念的再生产与中印话语实践

由于“多维属性”与“反中心性”两个特征的双重作用,“全球南方”不仅表现出统一立场,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差异化。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对“全球南方”身份的讨论不能停留在整体性的描述上,而需要进入具体国家的身份实践加以分析。

^① 孙银光:《制造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中国教育学刊》2015 年第 1 期,第 54~59 页。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其话语不仅具有鲜明的南方国家特色,还融入了各自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战略定位,对其他南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比发现,中印两国的南方话语在落后与蓬勃发展两大要素上的态度高度一致,而在被殖民、边缘与主张道义等要素中存在话语分歧。

(一) 中印两国的相似建构:落后与蓬勃发展要素

“全球南方”刚性话语中的落后要素与柔性话语中的蓬勃发展要素表明了“全球南方”建构中的经济—实力维度与发展—时间维度。这两个要素深刻揭示了南方国家相对于北方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绝对差距,以及不断缩小的相对差距的共性特征。而中印两国在发展道路、国家地位、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目标和取得的成果相似性更为明显,因此表现为与之对应的“落后”“蓬勃发展”话语要素较为一致。首先,中印两国工业化发展进程极为相似。20世纪50年代,中印相继通过国家计划着重推进工业体系建设,又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实施市场经济转型,在全球化中再次实现工业的飞速增长。^①其次,中印两国同时面临产业升级的发展困境。两国都在寻求向高附加值链条跃升,摆脱长期依赖的由外贸与投资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价值链低端锁定与核心技术瓶颈一时难以克服。最后,中印两国提升了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话语权与参与度。基于两国的综合实力与经济体量,中印已经深度参与全球多边机制中的制度塑造与议程设定。

中印两国发展水平的相似处境,使得双方在构建落后要素与蓬勃发展要素的南方话语体系中保持一致。在落后要素中,两国都强调本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社会发展仍然不足,与成熟发达的全球北方社会发展水平形成鲜明对比。两国均提出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完全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将国家国情精准判断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这一阶段可能将持续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②中国承认,尽管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6、欧盟的1/4,人类发展指数也排在世界

① 赵江林:《中印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研究》,《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49~68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80 位以后。^① 虽然中国在 2020 年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 2021 年达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但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中也同时强调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中国的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②

印度也承认尽管经济总量增长显著,但其发展阶段仍具有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印度极少直接指出本国发展的不足,但从其表述中还是能够发现对本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的清晰认知。2024 年印度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印度经济白皮书,其中批评了 2004 年至 2014 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为首组成的“团结进步联盟”联合政府的治理成果。该文件认可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印度过度依赖外国投资,容易受到他国货币政策影响,属于“脆弱五国”之列。印度官员直接指出:“在 2014 年莫迪总理上台时,印度是一个支离破碎、深陷困境的经济体。”^③印度财政部公布的《经济调查(2023-24)》中印度 2023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484.8 美元(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约在 1.4 万美元左右),国民收入水平清楚反映出印度仍处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④ 印度总理莫迪在 2022 年的独立日讲话中提出新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在印度独立 100 年之际,即 2047 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也说明了印度当前发展水平仍然有限。

在蓬勃发展要素中,作为国际体系中新兴的后发大国,中印在各自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潜力。在经济领域,两国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迅速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制

① 《增进互信,深化合作,迎接中欧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欧洲智库媒体交流会上的演讲》,2019 年 12 月 17 日, 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zyjh_682456/201912/t20191217_9385366.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9 月,第 70~72 页。

③ “India on Track to Become \$35 Trillion, Fully Developed Economy by 2047: Shri Piyush Goyal,” February 19, 2024,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2007105®=3&lang=2>。

④ “Ministry for Finance of India: Economic Survey 2023-24,” December 11, 2023, <https://www.indiabudget.gov.in/budget2024-25/economicsurvey/doc/eschapter/echap05.pdf>。

造业基础,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性转变,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两国普遍认为,其经济增速长期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并对此表示高度认可。中国指出,按经济总量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这些成就标志着在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决定性成果。^① 印度也积极评价本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指出本国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预计经济增长率在2025年达到6.2%、2026年达到6.3%,在全球和地区其他国家中保持稳固领先地位。^② 另外,两国都主张推动创新发展,在全球产业转型中的扮演重要角色。在面对产业升级、技术开发、绿色转型等共同发展难题时,两国与发达国家开展了产业链互嵌、规则对接、共享平台联合研发等合作。中国指出,在《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本国在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排名中位列第11位,是过去十年中排名上升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推进开放包容的科技合作。^③ 印度高度评价本国所拥有的全球第三大初创企业生态系统,通过该系统展示了国家创新活力。快速增长的初创企业、数字技术和新兴产业正在增强印度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并为其与发达国家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奠定基础。^④

在政治领域,中印都是发展中大国,两国一方面在国内层面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制度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对民主和法治建设探索持续深化;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也是国际体系内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成员,深度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在亚太及印度洋区域具有重大影响力。中国始终秉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强调本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捍卫并完善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18日,第12~13页。

②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India: Fastest-Growing Major Economy,” April 23, 2025,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2123826>.

③ “China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Pursue Open, Inclusive Sci-tech Cooperation,” October 16, 2024,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202410/16/content_WS670eff04c6d0868f4e8ebeb.html.

④ “India Sees the Emergence of the 100th Unicorn,” May 6, 2022,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23347®=3&lang=2>.

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作用。^① 印度也提出本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南方国家的坚定代表，将为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秩序承担责任。在这一背景下，印度认为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将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可以预见，印度作为“第一响应者”的角色将日益常态化，尤其是在周边地区内，一旦出现需要集体行动的局势，国际社会往往期待印度以不同方式参与相关的应对与协调。^②

（二）中印两国的不同建构：被殖民、边缘和主张道义要素

“全球南方”刚性话语中的被殖民要素、边缘要素与柔性话语中的主张道义要素分别体现了历史—制度维度、政治—战略维度和价值—文化维度。中印两国对殖民历史的解读、对国际秩序与国家角色的战略定位，以及对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的理解上各有侧重。由于“全球南方”概念的多维属性导致的概念泛化以及反中心性对抗意味的共同作用下，由此形成不同的话语重点与政策取向。中国的南方话语更突出立场鲜明、张弛有度的特点；印度的南方话语更突出谨慎回避、稳定克制的特点。

1. 被殖民要素。中国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予以坚决否定。中国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受到多个西方列强侵略，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主权没有完成沦为殖民地，但实质主权已经丧失。中国一贯明确地对殖民主义持全面批判态度，体现了彻底清算殖民主义历史的决心。首先明确历史叙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形成的等级秩序进行彻底否定。中国将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视为民族灾难的根源，强调其对中国近代衰落的破坏性影响。中国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视为“百年国耻”，遭受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严重冲击。^③ 其次收回国家主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清除殖民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否定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直接驱逐殖民势力，还取消了西方国家在中

① 《王毅：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2015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mfa.gov.cn/wjhz_673089/zyhd_673091/201506/t20150627_7575487.shtml。

② “Remark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Dr. S. Jaishankar at the Launch of India's World Magazine,” December 15,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F38804%2FRemarks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Dr_S_Jaishankar_at_the_Launch_of_Indias_World_Magazine.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 页。

国境内所有特权,外国驻军与特权机构撤出,被割让的中国领土予以收回。最后重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避免殖民遗产延续。中国从社会制度、教育文化上改造殖民遗产,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性。西方化的行政制度被废除,通过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了与旧殖民势力相互勾连的封建残余和买办阶级,对外国在华资本实行国有化,建立了独立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改革旧的文化教育机构、开展扫盲运动、推广普通话与文字改革、推动创作新的文艺作品,以清除殖民文化影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树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对殖民主义的深刻批判彰显了其对历史正义的强烈诉求,体现了反对殖民主义这个底线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而印度对殖民历史的批判较为温和。印度的殖民时期与中国不同,直接被单一宗主国英国统治,完全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所有主权。印度的被殖民历史更为悠久,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间接统治到印度事务部成立后英属印度建立了现代殖民官僚体系,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持续了近 200 年。在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与国内民主意愿兴起的背景下,印度开始寻求民族独立。一方面,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印度对英国殖民者的态度较为保守。领导革命的国大党在建立初期,受到英国的有意扶持,其目的在于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所以早期国大党的成员主要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阶级精英,旨在继续维持英国对印度的控制。^① 随着国大党转向推翻殖民统治,这些政治精英出于社会团结和战略考虑,主张温和的策略,所以印度采取了以维护自主性为首要目标的策略性克制手段。在推翻殖民统治的进程中主要借助谈判,而非武装革命的方式,这使英国殖民体系在印度得以存续。印度缺乏彻底推翻旧秩序的动力,所以在批判英国殖民主义的剥削本质时有所保留,承认西方殖民对国家统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② 另一方面,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国大党的领导下,印度在 1947 年没有获得完全独立,只是争取到了自治领的地位,

① Hira Lal Singh, *The Internal Policy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 1885-1898*, PhD dis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3, p. 231.

②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07 ~ 408 页。

仍然隶属于英国管辖,直到 1950 年才正式成为共和国。独立之后,印度还保留了英国的政治与行政体系,法律体系也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主要官方语言仍为英语。印度不效忠英国国王,但保留了英联邦成员身份(虽然英联邦建立在自由、平等、自愿的合作基础之上,但是并不能消除其殖民历史的象征意义)。尽管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已逾 70 年,但直到 2014 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采取一系列政策后,印度民族解放史才进入一个新的篇章。莫迪上任后,高度评价印度教传统的价值,提议将印度的英文正式名称从“India”改为来自古印度典籍的“Bharat”;他还将新德里首都核心区的标志性道路的名称从“国王大道”改为“责任大道”,推动印度议会从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政府建造的旧议会大楼搬入全新的大楼等,种种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举措被认为是印度逐步消解英国殖民痕迹的力证。英国《卫报》曾发表题为《印度:又一次与命运的约会》的社论评价 2014 年莫迪当选总理后的种种行为,指出这一天可以作为英国最终离开印度的日子而载入史册,也标志着印度与英国统治时期并无太大差别的权力结构统治的时代终于结束。^①

2. 边缘要素。中国认为,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更加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借助新的治理机制改善“全球南方”的边缘地位,主张通过创新引领的方式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理念:在全球发展倡议中确立了新南南合作模式,重点是秉承“授人以渔”理念,以中国的技术援助、发展模式和经验分享为主,培养国家自主增长能力;^②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提出“安全不可分割”的合作安全观,同时建立中国版的冲突调解机制;^③在全球文明倡议中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思想;^④在全球治理倡议中明确表明不仅要继续维护主权平等和国际法中心地位的既有原则,还创新性地构建“人本主义”全球治理目标和深度民主全球治理原则。^⑤

① “India: Another Tryst with Destiny,” The Guardian, May 1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2014/may/18/india-narendra-modi-election-destiny>.

② 曹德军:《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国际论坛》2024 年第 1 期,第 3 ~ 21 页。

③ 赵可金:《全球安全倡议的创新性》,《国家安全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130 ~ 135 页。

④ 朱中博:《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9 ~ 47 页。

⑤ 余博闻:《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守正创新之道》,《国际关系研究》2025 年第 6 期,第 30 ~ 52 页。

印度则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受到多边秩序的不公待遇,应该采取融合替代的方式进行改善。印度认为本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安全、气候治理的贡献被严重低估,尤其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增加更多席位,主张自身获得常任理事国资格,才能更公正地反映当今世界格局。^① 印度提出,国际秩序正在以实力为主导、而非公平正义,即在“强权即公理”的逻辑下,本国作为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在现行国际体系中正遭受“制度性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结构性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负担。^② 印度面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旨在提升自身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通过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代表的外交策略,使本国获得更多机会参与和协商国际事务,进而改变“全球北方”的唯一中心地位。

相比较之下,中印两国改善全球南方国家边缘地位的方式明显不同。中国通过不断建立包容多元的新机制、新规范,维护南方国家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重塑不平等的既有秩序。一方面,中国致力于保护被忽视的南方国家利益。从实践角度来看,倡导地区安全事务应避免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而是由地区国家自行解决,并建立包容性对话机制;从观念角度来看,国际话语在单一文明标准下形成了隐形等级,应在承认国家文明的多样性的情况下,保障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避免以“普世价值”之名对非西方社会进行规范性压制。另一方面,中国也致力于提升南方国家发展权,推动“发展优先于政治对抗”的议程设置,重点回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安全、消除贫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紧迫发展需求。中国还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以务实发展合作为导向,不将治理模式、意识形态或国内政治改革作为融资前提,重点关注南方国家在交通、能源、水利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项目,改变这类项目在传统由北方国家掌控的融资平台上因为种种制约而难以获得持续支持、限制国家发展的困境。

① “PM's Interview to Les Echos,” July 13, 2023, https://www.pmindia.gov.in/en/pms-interview-single/?interview_id=16053201.

② “National Statement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Dr. S. Jaishankar at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8th UNGA,” September 26, 2023,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7148/National_Statement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Dr_S_Jaishankar_at_the_General_Debate_of_the_78th_UNGA.

而印度则更多是通过充当“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桥梁角色,来推动北方国家关注并回应南方国家的切实关切与发展需求。自 2019 年开始,印度连续被邀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总理莫迪对此表示,印度力图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优先事项和关切带到全球舞台上,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也会一直将“全球南方”的问题放在首位。^① 2023 年印度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与会各国在领导人宣言中涉及俄乌问题的表态上分歧严重导致会议多次濒临“破裂”,印度向发达国家传递出全球南方国家不愿选边站队的立场,坚持言辞温和的宣言版本,最终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成员国都接受了这一版本——不仅没有批评俄罗斯,还将 2022 年峰会宣言中的“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替换为更为中立的“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表述。^② 印度还努力吸引全球北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与之共同参与南方合作。例如,在对非投资中和日本深度合作,与日本建立“亚非增长走廊”,专门对非洲和西亚地区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可持续增长等方面进行投资。印度支持通过制度内改革逐步提升南方国家话语权,是平衡多方利益、降低风险与成本的保守选择。

3. 主张道义要素。中国继承了儒家“天下大同”思想,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各国利益交融。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在基于和平友好的基础上,提倡和谐发展、共享利益。这种极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使中国与其他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国家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国情复杂,协调全球南方国家利益异常困难。中国经常从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作出妥协,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努力寻求共赢合作。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积极协调各方利益,领导日益分化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气候协定制订中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有利的减排和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挂钩。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提高

① “Government of India: Transcript of Special Briefing by Foreign Secretary on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Italy for G7 Summit,” June 12, 2024, https://www.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37863/Transcript_of_Special_Briefing_by_Foreign_Secretary_on_Visit_of_Prime_Minister_to_Italy_for_G7_Summit_June_12_2024.

② “G20 New Delhi Leaders’ Declaratio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g20.in/content/dam/gtwenty/gtwenty_new/document/G20-New-Delhi-Leaders-Declaration.pdf.

“国家自主贡献”标准,承诺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是全球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另外,中国也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提出的缓债倡议,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中国的缓债金额是最大的,已经同 19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缓债协议或达成共识,还免除了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境内最不发达国家重债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截至 2018 年底到期未偿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新冠疫情爆发后又免除了 15 个非洲国家到 2020 年底的无息贷款债务。^① 中国重视集体利益,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合作阻力,强调渐进式而非激进颠覆的方案,既保障了南方国家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避免引起激烈的对立对抗。

印度受到印度教和佛教哲学的影响,“非暴力”与“不结盟”是其外交政策的精神根源。“自治”是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最根本的哲学思想之一。虽然国大党在印度政坛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但这一思想遗产依旧是当代印度主要政治思想。“自治”既可以解释为摆脱任何束缚的自由,与全球北方国家“主权平等”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独立自主”等价值观相联系,也可以理解为掌握管理本国事务的主导权,因此在与其他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合作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中印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投资促进发展协议》谈判中的立场,清晰展现出两国在道义要素中的不同。这一协议是中国在世贸组织与相关发展中成员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的首个重大议题,协定达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这一协定的目标是通过简化投资规则,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外资,促进经济增长。该协议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据分析表明,该协议可以产生 2500 亿美元至 11200 亿美元的全球福利收益,主要惠及较贫穷的国家。^② 在协议最终签署时有 90 个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其中 27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③ 印度对该协议持反对态度,希望保护本国的政策自主权,警惕新协议可能带来的束

① 《国新办举行“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新闻发布会实录》,2021 年 11 月 26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new/202201/t20220113_10492124.shtml.

② Edward J Balistreri and Zoryana Oleksyuk, “Economic Impacts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Yeutter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Review, February, 2021, <https://www.card.iastate.edu/products/publications/pdf/21wp615.pdf>.

③ WTO,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IFD) Agreemen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invfac_public_e/invfac_intro_e.htm.

缚,同时坚持成员国“全体共识”原则,不认可支持国自行加入的方式。^① 印度传统的“自治”理念为其提供了灵活的政策空间,可以根据本国利益需求进行调整,体现了在国际压力和长期战略中协调的谨慎考量。与此同时,也是基于这种理念,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印度在面对一些涉及南北之争的难以协调的问题上缺乏战略胸怀,权衡太多,最终奉行的政策可能与大多数南方国家意愿相悖,很难保障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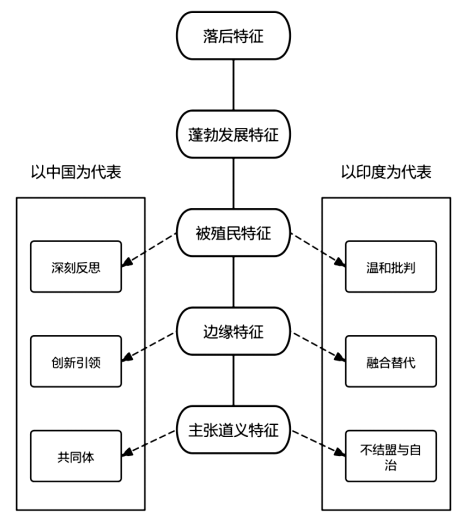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印两国的南方话语实践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当面临话语困境时,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倾向于以全体利益为优先,强调以南方共识为合作基础,并通过在相对容易达成协作的领域推动合作来强化“全球南方”的功能性,同时从根本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在与“全球北方”的关系上,中国态度明确地坚持清晰的民族史观,既要对于历史错误深刻批判,也要对于发展问题平等协商。而印度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以及与全球北方的关系中更多强调在多方之间保持平衡:既要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又力求不削弱全

^① “Minutes of The Meeting Held in The Centre William Rappard and in Virtual Format on 21-22 March 2024,” May 24, 2024,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GC/M210.pdf&Open=True>.

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潜力,同时还要避免破坏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特殊联系。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话语表现得格外谨慎,在保证国家政策灵活性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有限改善。

五、结 论

在如今大国竞争激烈、全球秩序面临调整的重要时刻,“全球南方”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自二战结束以后,全球南方国家大多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且在个别领域正在赶超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权力结构重组的关键力量。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日益提升,推动着国际关系学界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模式,打破西方理论主导的知识体系。后结构主义通过差异性建构形成的政治话语场域,研究其如何建构“自我”与“他者”,有助于揭示身份政治的运作机制。这一研究路径表明了“全球南方”被边缘化或符号化的主体性结构。

长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西方国家为范式建构世界图景,将“全球南方”边缘化为发展迟滞的“他者”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南方国家的蓬勃发展也展现了其在“去西方中心化”中的作用,正在与“全球北方”构建更平等的身份结构。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柔性话语直接构建了有差异的平等身份,而通过刚性话语表面上是以“受害者”或“被边缘者”自居,但主动建构弱势并不意味着“自我矮化”,反而与强势他者形成对照,占据了道义优势。“全球南方”通过话语的构建,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挑战了西方的合法性,逐渐从边缘靠近中心,展现了其在主体性和规范建构上的双重能动性。

“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具有动态性,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集体性概念,会随着政治话语的演变而逐渐改变,其多维属性和反中心主义构成了该概念的重要特征。“全球南方”复杂的身份结构带来了一系列现实困境和协调难题。以具有代表性的中印两国南方话语为例,可以发现由于南方国家的身份结构涉及五个维度,所以众多南方国家难以统一。全球南方内部巨大的认同张力,使众多国家

难以形成集体战略,也缺乏统一代表机制,无法合力更有针对性地对现有国际秩序提出强有力的改进方案。虽然多维属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实践,但保障了全球南方国家重要的战略优势,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利益诉求、制度认同与对外政策路径上保留了差异性与自主性。一方面,不同话语的身份特征只是在侧重点与表达方式上相对差异较大,但从根本上对其认知还是存在明显共同点。另一方面,身份结构的多元性能够保证“全球南方”覆盖更多的国际议题,同时也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促进多极与多文明共存的核心主张。

后结构主义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分析不在于提供宏大理论,而在于解构既有认知框架,并拓展理解“全球南方”的认知边界。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后现代取向的分析工具,后结构主义促使学界重新审视西方中心元叙事的功能与逻辑。“全球南方”的概念虽然始源发达国家的话语历史遗产,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国家正在不断协商和重塑自身主体性。本文在该研究领域作出初步探讨,所涉及的内容在“全球南方”整体研究图景中只是有限部分。在理论层面,解释了该概念并非是中性的描述性概念,而是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经由话语不断建构而成,并由此突破了将其与“全球北方”简单对立的传统认知框架。在此基础上,为研究后续概念的再生产与扩展提供了研究基础。在实践层面,本文关注身份作为一种话语产物如何使南方国家确定自身行动边界,进一步引发对南方国家政策取向与战略选择的深入反思与讨论。

“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仍将长期呈现出多元化与动态演进趋势,中印两国在未来仍是推动南方国家身份拓展与话语重塑的中坚力量。受制于各自所处的国际结构位置、发展阶段以及对外战略选择的显著差异,两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与界定并履行国际责任等敏感议题上将继续作出不同回应。未来,包括中印在内的南方国家能否持续关注“全球南方”的动态特征,在维护内部认同的同时及时通过实践补充新的时代含义,将是“全球南方”继续发展壮大的一环。

【责任编辑:卫蔚】